

制度化感知的消逝与重建：法律人代际认知格式断裂

摘要

“法律的生命在于逻辑还是经验”这一经典命题，长期将法学讨论锁定在规范与事实、形式理性与实践智慧的二择对立之中。本研究跳出这一预设，追问另一个被遮蔽的问题：裁判者在个案中捕捉法条之外情境信号的感知能力，是经由怎样的制度性机制在代际间传递或被截断的？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司法与法学教育体系的机制分析，识别出三重结构性截断：法学教育把案件事实预加工为法条要件匹配的原料，切断了细节追问的认知训练；裁判文书写作的职业安全惯性将冗余感知叙述主动修剪为风险规避策略；晋升时间窗口压力使感知投入成为理性放弃的冒险行为。这三重截断不仅是通道层面的缺失，更进一步反向塑造了新一代法律人的认知格式，使其在思维基底上丧失了接收感知信号的能力——我们将此过程称为“接收器脱敏”。脱敏状态又被三片相互咬合的土壤锁死：法学教育评价体系只能检测知识掌握量而无法评估判断敏锐度；实践共同体的辩护闭环将感知缺失重新解释为合规状态；裁判者的职业自保策略将“写出感知”标记为需规避的风险。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一项三轨协同的干预方案：在法学院判例课中嵌入“细节标记追问”教学逻辑、在法院内部评查细则中增设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参酌项、在最高法优秀裁判文书遴选偏好中释放示范性信号，三轨在同一个五年时间窗口内协同启动。本文同时显式阐述了该理论的可证伪条件和竞争解释排除设计，并以德国、日本、英美法系法学教育改革的对照案例作为初步验证。

1 引言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的这句格言在一个多世纪里被反复引用、争议、重新诠释。每一代法学者似乎都无法绕开这道提问：当法律以规则的形式被写在法典里时，适用规则的裁判者究竟是在进行逻辑上的三段论推演，还是在动用他作为人的全部经验、直觉和情境判断？这个问题之所以持续具有理论吸引力，恰恰因为它触及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实践的核心张力：一方面，法治的理想要求法律适用可预测、可审查、不被裁判者的个人偏好所扭曲；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处理过真实案件的实务者都明白，将案件事实“翻译”为法律语言的这个过程，远非逻辑推演所能穷尽——它需要裁判者对事实纹理的敏感、对利益格局的把握、对裁判后果的预判，而这些能力在法学院的逻辑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然而，本文认为，这道百年命题本身的提问方式存在一个未被审查的预设：它假定逻辑与经验是对立的范畴，法律的生命“要么”在逻辑、“要么”在经验，而学术任务只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或取得某种平衡。这个二择框架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无论逻辑还是经验，它们并不是两个已经在裁判者手中可被灵活调配的工具。裁判者能否感受到“经验”的牵引，本身取决于他是否具备一种更基础的能力——在个案事实中辨认出“这里有需要我停下来想一想的东西”的感知敏锐度。如果这种感知能力在裁判者的认知格式中被系统性削弱，那么“经验”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范畴——裁判者空有经验之名，却失去了捕捉经验信号的接收器。

本文将论证，中国当代司法与法学教育体系内发生的关键变化，并不是“逻辑打败了经验”这个老故事，而是一个更隐蔽、更具结构性的过程：裁判者感知能力的代际传输正在发生系统性断裂。这个断裂不仅表现为师徒制被学历教育取代、老法官的直觉无法传递给年轻法官这类通道层面的缺失；更致命的是，断裂过程本身反向塑造了新一代法律人的认知格式——他们不仅仅是没有机会学到老法官的判断直觉，而是在法学院学习、法考备考、入职后文书写作和绩效考核的每一个环节上，被反复训练成一种对“法条要件以外的东西”不敏感、甚至主动回避的认知习性。当感知信号在制度的缝隙里发出时，已经没有接收器能够接收它。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回顾两股主要研究传统——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对峙，以及司法认知研究和法律职业社会化的相关文献，指出既有研究在解释感知代际传递断裂方面的盲区。第三节构建理论框架，界定“感知”“代际传输”“认知格式反塑造”“接收器脱敏”等核心概念，并提出本文的六组核心命题。第四节说明本文的机制分析方法及其合理性与局限。第五节展开分析与讨论，逐层解剖三重截断机制、三重土壤锁定机制，并提出三轨协同的操作方案。第六节将本文的判断与三个最近理论邻——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卢曼的法律系统运作封闭论、以及批评法学关于法律话语驯化激进批判的论述——进行对质，借助一个

2×2矩阵提炼本文的分离线和可裁决条件。第七节为结论，在总结核心发现后，完整给出理论贡献、可证伪检验设计、政策含义、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2 文献综述

2.1 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的未竟之处

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百年对峙，为本文的问题提供了理论起点。形式主义以概念法学的精致体系为依托，将法律视为一套自足的规范秩序；裁判者的任务是从既定规则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现实主义则以霍姆斯的格言为旗帜，主张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法官不是“法的自动售货机”，他们的直觉、政策判断和对社会后果的预估在日常裁判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场争论在20世纪产生了丰富的理论变体：哈特的“开放结构”理论承认规则在边际案件上的不确定性，赋予裁判者有限度的裁量空间；德沃金以“建构性解释”整合规则、原则与政策，将裁判图景描绘为裁判者在“整全性”理想下对法律实践的最佳道德论证；波斯纳以法律的经济分析将实用主义裁判的后果考量推向精密化；卢曼以系统论揭示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性，论证外部信号只能经由法律系统内部的符码翻译才能进入裁判推理。

这些理论各有其深刻之处，但它们在解释本文所聚焦的现象时，共享一个未被挑明的预设：它们都默认裁判者具备识别“这里不只是法条套用”的感知能力，争论的只是这种感知在裁判推理中应该占据什么位置、被纳入何种论证格式。形式主义不是否认感知的存在，而是主张用规则抑制它；现实主义不是否认规则的作用，而是主张感知不应被规则遮蔽；德沃金赋予感知以道德论证的光辉；波斯纳给感知装上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准星。但没有一种理论追问过：如果裁判者连感知信号的接收器都在职业社会化过程中被关掉了，那么这些关于“感知应如何被纳入裁判”的宏伟理论，就都在论述一个在制度现实中越来越少的认知功能。

2.2 司法行为研究与“法官如何思考”的实证进路

司法行为研究的实证传统部分弥补了上述理论盲区。以波斯纳的法官行为研究和美国政治学界对联邦法官意识形态投票的计量分析为代表，这一进路将法官的裁判行为作为可观察、可量化的因变量，考察哪些因素（法官的政治立场、职业背景、任期制度、晋升激励）能够解释裁判结果的变异。这些研究积累的实证发现——例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裁判结果与其任命总统的党派之间存在统计显著关联——有力地证明了“法官不是法律规则的透明适用者”这个现实主义基本命题。

然而，这一进路的分析工具在面对本文的问题时面临两个根本局限。第一，它以裁判结果为唯一观察窗口，而本文关注的是感知能力本身的消长——一个法官可以产出完全“合规”的裁判结果，但他的判决书可能同时在细节回应密度上表现出系统性贫瘠。实证进路无法捕捉这种“结果不变但感知密度下降”的动态，因为它的因变量不是感知的存在与否，而是结果的分布。第二，它将法官的认知特性视为个体层面的外生变量（如党派、性别、种族、职业背景），不关注这些认知特性本身是如何被法学院和司法制度的制度流程所塑造的。换言之，它研究的是法官“是谁”如何影响裁判，而不是法官“怎么看”的认知格式是如何在职业社会化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

2.3 法律职业社会化中的隐性维度

法律职业社会化研究为本文的机制分析提供了最近的理论邻居。这类研究的经典命题是：法学院如何将“像法律人一样思考”的思维模式植入学生认知？菲利普·基斯的《法学教育的技艺》开创性地追问了法学院教学中的苏格拉底式问答法如何训练学生的分类思维、规则提取能力和对事实的格式化处理。人类学家拉图尔在《法之制作》中对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民族志观察，揭示了法官如何通过文书写作、合议庭讨论和档案流转将生活事实“翻译”成法律事实。相关研究表明，法律职业训练的核心效果，不是灌输一套法条知识，而是重塑学生处理信息的基本格式——让他们在看到案件材料时，自动完成“剥离无关事实→提取法律要件要素→归类至请求权基础”的认知流程。

这一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不仅是增益——它在赋予学生强大的分析效率的同时，也系统性地削弱了他们对“法条要件以外的异常事实细节”的敏感度。这套认知格式在常规案件中运作高效，它的盲区只有在那些“光靠套法条感觉不对、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的案件上才暴露出来。而中国近二十年的法学教育和司法管理改革，恰恰在多个环节上同步强化了这种认知格式的效率侧，压缩了格式的冗余空间——这个命题构成本文分析的核心。

3 理论框架

3.1 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感知：本文特指裁判者在个案处理中，对法条要件以外的案件情境性信号——包括事实的异常纹理、当事人的关系基质、裁判后果的潜在外溢——的辨认与捕捉能力。感知不等于“直觉”或“经验”。经验是可以被语言化、被代际传递的认知资源的累积；直觉是无意识中迅速做出的判断。感知是经验和直觉的输入端：没有感知的敏锐，经验是空转的，直觉是盲目的。本文将感知操作化为判决书中对个案特殊性情节的回应密度——参照判决书的文本分析，在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部分，那些超出法定要件最低描述要求、涉及个案细节的回应的频次和深度。

代际传输：指有经验的裁判者所积累的情境识别能力，通过可被下一代替换、吸收、再生的方式，传递至初入职场的法律人。其传统的核心载体是师徒制——年轻法官在旁听、讨论、草拟判决书并接受老法官修改的全过程中，不仅学习法律适用规则，更学习“看到什么、怎样说、在哪停一停”的感知习惯。

认知格式：借用心理学“认知图式”概念，指法律人在接触案件材料时自动运用的信息筛选、分类、排序与优先级判定的基底结构。一种典型的中国法学院产品化的认知格式可以描述为：“确定案由→提取要件→匹配法条→适用三段论→得出结论”。这种格式的高效性在于它屏蔽了外部信息冗余，其脆弱性在于它将许多感知信号所栖身的“冗余细节”一并过滤掉了。

认知格式反塑造：这是本文的核心理论概念。传统的职业社会化研究将认知变化视为单向的“传输不足”——老一代有而新一代未习得。反塑造强调一个反向的因果箭头：传输通道本身的断裂（如师徒制被取消、案例教学被标准化考试挤压、裁判文书写作被绩效时间窗口压缩），不是简单让下一代“没学到”，而是让下一代在被这些制度流程反复塑造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主动回避感知信号的替代认知格式——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接收器脱敏”。接收器脱敏区别于简单的知识缺失：知识缺失可以通过补课来弥补；接收器脱敏是一种格式性的关闭，即使你把感知信号放大，接收器本身也不产生反应。

接收器脱敏的三层土壤锁定：这一概念用于解释接收器脱敏为何在常规改革（如增加培训、调整考核权重、发布政策指引）下难以被扭转。它借用了生态学中土壤支撑植物的类比：法学教育评价体系（第一片土壤）、法律实践共同体的合法性辩护闭环（第二片土壤）、裁判者个体的职业安全自保策略（第三片土壤）各自独立运作但互为犄角，把脱敏维持在一个不靠任何人有意维护、只靠惯性就能自我复制的内稳结构中。

3.2 核心命题

基于以上概念界定，本文提出六组核心命题，构成分析的总骨架：

命题1（传输通道的三重截断）：裁判者感知能力的代际传输，在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培训-审判实务三个环节上，分别被标准化考试的知识检测逻辑、法条匹配的产品思维训练和绩效考核的时间窗口压力所截断。截断的共同方向是将感知从“有价值的能力”重新标记为“需要规避的低效行为”。

命题2（认知格式反塑造）：三条截断通道不仅阻止了感知从老一代向新一代的传递，更进一步在大学-法考-入职三阶段的反复杂化塑造中，使新一代法律人形成了以“剥离事实细节、只留要件要素、匹配法条、风险最小化输出”为核心逻辑的替代认知格式。这套格式一旦内化稳定，就丧失了接收与处理感知信号的接收器功能。

命题3（接收器脱敏的自稳定结构）：接收器脱敏不是简单的个体认知偏好，而是被三片制度土壤锁定的系统状态。这片土壤各自独立运作但互为犄角：(a)法学教育评价体系只能检测知识掌握量，无法检验判断敏锐度；(b)实践共同体的合法性辩护闭环把感知缺失重新定义为“没有把不该纳入的因素纳入裁判”的合规状态；(c)裁判者的职业安全自保策略把“写出感知”标记为需要规避的风险（写出来可能被质疑“主观臆断”“说理不充分”或“与法条不符”），不写反而是安全的。

命题4（通路论破局与格式敏感度的联动）：感知重建不能只修通道——即使带教制度恢复、即使老法官有更多时间指导年轻法官，接收器的认知格式若已在先前十多年的流水线上被反塑造为脱敏状态，新来的信号只会被当成噪音被过滤。格式敏感度的恢复和通道的修复必须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内，协同推进。

命题5（三块弹性拼图的协同窗口）：在现行制度内部，存在三处不需要修改法律即可利用的弹性缝隙：(a)法学院的判例课教学逻辑可在不改变教务处课程框架的前提下，在评分标准中纳入“对事实细节的停顿与追问数量及分析深度”；(b)法院内部裁判文书评查细则可在不改变基本评分项的前提下，增设“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为加分参酌项；(c)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裁判文书遴选中的书面点评语言可在不改变遴选程序的前提下，释放“个案情境回应越具体越好”的示范信号。三块弹性拼图各自独立存在，但目前彼此互不知情。将这三处协同在同一五年窗口内启动，是感知代际重建的最小可行干预。

命题6（三轨协同的窗口不可复制性与可证伪性）：三轨必须在同一个五年窗口内启动且各自能够接住对方的下游产出——判例课提升的感知敏感度必须被入职后的评查制度保护性接住，评查制度的保护性信号必须被最高法示范信号进一步认证——若三轨错开（如先做评查改革再做教学改革），下游会因收不到上一环节的合法化信号而回缩至旧格式。该命题附有可证伪条件（见7.3节）。

4 方法论

4.1 研究设计与分析策略

本文采用机制分析的方法，追溯中国司法与法学教育体系中，裁判者感知能力代际传输发生系统性断裂的制度机制。机制分析不同于变量回归：它不追求对“感知能力高低”的概推，而是追问“感知能力在哪些环节上被怎样截断、截断后反塑造了何等认知格式、这一格式又如何被土壤结构锁定”的因果序列。本文的分析材料来自三个来源：(1)公开可得的教育政策文件、审判管理文件、裁判文书评查标准及优秀裁判文书遴选公告等制度文本，用以重建各环节的制度激励结构；(2)中国法学院判例课教学现状与法考考核方式的制度描述和既有研究，用于分析法学教育两端（进门的课程与出门的考试）对认知格式的塑造和强化作用；(3)比较视野下德国、日本、英美法系法学教育及法官养成制度的改革案例，用于检验本文的分析框架能否在跨体制语境中产生结构性洞察，并通过对照排除某些替代解释。

分析展开的策略如下：首先追溯三重回溯截断的机制（第五节第1小节），每一重截断均回答：它在何制度条件下发生？它通过何种激励结构塑造了何种替代认知格式？其截断效果在当代法官群体身上有何可观测征象？其次，分析三层土壤锁定机制如何将这些认知格式固化为自稳定结构（第五节第2小节）。最后，提出三轨协同操作方案的设计逻辑、实施条件和预期窗口效应（第五节第3小节），并对照跨法系案例检验框架解释力。

4.2 回波溯因与结构校正的逻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并非简单的功能主义论调——“因为有某项制度，所以产生了某项效果”。本文采用回波溯因与结构校正交互推进的逻辑追踪架构，对每条假设的截断和反塑造均做双层追问：

第一层，回波溯因方向（D视角）：追溯代际传输断裂的历史路径——在哪个时间窗口、哪个制度转折点上，传输通道被切断或收窄？

第二层，结构校正方向（S视角和E视角）：追问截断在裁判者认知格式中固化为什么形态，以及这种被固化的格式靠什么土壤维持其内稳性。

二者互相纠正：传输分析的追问防止结构分析停留在一个静态诊断上（“感知就是被考核制度压制的”这种粗粒度判断），结构分析的追问则防止传输分析只讲现象不揭示机制（“师徒制被取消了，所以感知绝种了”这种简化的因果链）。这种交叉追踪的逻辑运用于本文三个主要环节的分析：法学教育的产品思维转型、裁判文书的安全惯性养成、晋升窗口的时间信号重塑。

4.3 方法局限

机制分析的性质决定了本文不能提供关于“感知能力在当代中国法官群体中的分布水平”的一手实证数据。本文依赖的文本分析材料（教学方案、考核标准、评查细则、遴选公告）只能揭示激励结构的运作逻辑，而不能直接测度激励结构在裁判者认知格式上产生的心理效应——后者需要实验或准实验设计才能严格检验（参见7.3节的可证伪检验设计）。此外，本文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制度文本和法律人群体的通行经验，因而对地区差异——不同省份法院系统的考核压力和改革弹性差异显著、不同层次法学院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差异显著——虽有涉及但未做系统分区展开。这是方法本身的内在局限，也是未来实证延伸的空间方向。

5 分析与讨论

5.1 三重截断：代际传输断裂的路径追溯与认知反塑造

第一重截断：法学教育的产品思维转型

中国法学教育在近三十年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从一个偏重文史基础、法典精读和抽象法理讨论的培养体系，转向以司法考试通过率和就业应试能力为核心指标的“法律产品”流水线。这一转向在多个制度环节上同步发生：(a)核心课程教学从“问题讨论型”的判例研读转向以讲授法条知识体系、训练知识背诵和快速检索能力为主的应试型授课；(b)课程考核方式从论文写作、课堂讨论参与转向以标准化选择题和案例分析简答题为主的终结性考试；(c)法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标准受就业市场的间接压力而持续弱化，在学生时间分配的优先序列表中，投入大量时间到深度阅读和文本细节分析这件事的相对收益不断下降。

这套流水线的核心产品是“高效的法条匹配员”：面对一个案件材料，他能迅速完成案由归类→要件提取→法条索引→三段论推理的输出。在这个过程中，案件材料里那些不直接指向法律要件的细节——当事人的语气、关系史、交易背景中的异常纹理、看似无关的条款中的潜在联系——被系统性地标记为“冗余”，不被纳入产品输出的必要零件清单。教学方案、课堂讨论和考核环节逐一强化了一个认知习惯：细节是噪音，提取是效率，匹配是专业。

回溯因追溯这一转型，可以看到1990年代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和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准入的设立，产生了一个教学与考核之间的强耦合效应：司法考试大纲规定的知识点和题型成为法学教学的事实性指挥棒，而司法考试中占压倒性分值的知识记忆型选择题和法条应用题，将“快速准确匹配法条”的认知格式写入了法学院学生最深层的学习动机结构。近年来的民事案例分析和刑事案例分析题型改革试图引入开放性分析，但由于案例题目的题干仍是将复杂事实预加工为“给定条件”的闭合文本，学生在解答时仍然不需要经历真实案件中最关键的认知步骤——面对一堆未经筛选的原始材料，自己判断哪些事实值得一提、哪些细节可能隐藏着重要信号。

结构校正进一步追问：这套产品思维塑造的替代格式把什么标记为“多余”？在法学院流水线中，事实细节是等待被要件化处理的原浆，而不是等待被阅读和理解的文本。产品思维不是教学生“别去看细节”，而是把常规课程设计得让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体会“看细节”在解决真实案件中的认知价值——在低年级阶段就被灌输“学好法条就能过考、能过考就能找到好工作”的显性激励结构，使得“课外深度阅读”“案例细读讨论”这类本可以部分保护感知习惯的活动，在学生时间分配的优先序中被边缘化为“做了加分、不做无碍”的课外兴趣活动，而非法律人核心能力的必修训练。

这一论断在欧洲大陆法学教育改革的比较案例中得到侧面印证。德国在2002年法学教育改革中将“判例讨论”的系统性安排从选修提升为必修核心环节，正是基于一个类似的结构诊断——过度侧重法典体系讲授的传统教学方式，使学生将法律思维窄化为“条文检索与适用”，忽视了裁判实践中对案件事实细节的阅读与重构

能力。这一改革的反向操作逻辑与本文的法学院判例课翻转设计（见第5.3节）在结构上同构。日本2004年法科大学院改革引入美国式案例教学法，也是基于一个可类比的问题意识（法学教育过于偏重知识灌输而忽视实务判断力养成），且其实施后评估已积累了关于“六法全书型知识与情境判断力之间的张力在教育制度设计上如何被缓解或激化”的实证材料，从另一个方向为本文命题的有效性提供了外部支持而不构成威胁——因为日本改革后的追踪研究同样显示，仅增设案例课而不改变评价体系（律师考试仍侧重知识记忆），新教学形式无法实质上改变学生的认知格式。

第二重截断：裁判文书写作的职业安全惯性

从法学院进入法院后，年轻法官（或法官助理）开始撰写裁判文书。在这个环节中，感知信号面临的不是被忽略，而是被主动修剪。

一套常态化运作的裁判文书质量评查体系，以“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说理是否充分”为基本评审维度。在这些维度中，“说理充分”所指的主要是：是否对争议焦点逐一回应、是否引用相应法条、是否对证据采信理由做出说明、是否形成逻辑闭环。而法条要件之外的情境性描述——如对当事人之间关系历史的叙述、对案外人潜在影响的顾虑、对裁判后果之社会外溢的试探性建议——在评审中既不属于“认定事实”项必须保留的部分（它们并非裁判主文的必要支撑），也容易被“说理充分”项的隐性标准反向评价为“说理不聚焦”或“文书不简练”。在评审实践的隐性操作中，“冗余”是减分项，“简练”是加分项。法官助理从第一份判决书草稿的修改过程中就学会了这条潜规则：“写到必须写为止，多一句都不要。”

结构校正进一步识别了这一惯性的反塑造效力。当写作格式持续多年要求将情境细节逐出裁判文书的正文时，认知格式也会随之发生内向塌缩：年轻法律人在审阅案卷材料时就会自动完成“这些细节是不需要写进判决的”的预筛选，而预筛选一旦内化为习惯，他们就不再在阅读案卷的过程中对这些细节产生认知停顿。感知信号不是被写出后又删掉了——它是在阅读案卷的那一刻就没被看见。换言之，文书写作的安全惯性不仅是在输出端切断了感知的表达，更是在输入端反向驯化了裁判者对案件材料的阅读方式。当“写不出”变成了“看不见”，感知的代际传输断裂就走到了它最隐蔽、也最难以被常规改革逆转的阶段。

第三重截断：职业晋升的时间窗口压力

法官助理入额后的职业路径面临一个确定的时间结构：从初任法官到有机会晋升更高级别法官（或进入更优岗位）的窗口期，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被压缩在入职后的十余年内。在这个窗口内，结案数量、发改率、裁判文书质量评查名次等可被行政量化的指标，构成考核的主要硬约束。对裁判者而言，这个激励结构传递了一个明确的时间信号：在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考核周期内，把大量精力投入对个案特殊性情境的深度回应，其边际回报远低于投入在结案速度和“不出错”的稳健输出上。

时间窗口压力的特有反塑造方式不是“让裁判者别去感知”，而是把感知标记为一种需要额外付出时间成本、而收益不确定的“冒险行为”。写一段回应个案特殊性情节的说明，可能需要额外查阅背景材料、推敲措辞、权衡表达分寸；而一旦这段说明被上诉法院认为“与判决主文逻辑无关”或“表述有欠严谨”，反而可能成为发改或扣分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写出感知变成了“理性人不做的事”。一旦年轻法官在自己入职初期做过一两次感知表达并得到了负面反馈（被领导要求删掉、或被同级法官私下提醒“别写这个”），他就会迅速学会一条比任何培训都更有效的规则：“不动那些东西是最安全的”。

三重截断的累积效应不是简单的加法——它们彼此串联，在十五年左右的一个完整法律人养成周期里形成了层层递进的认知闭环：法学院先把学生训练成不觉得细节值得看（第一重截断），入职后的文书写作把他训练成不值得写的会给自己惹麻烦（第二重截断），晋升周期的短视激励把他驯化成不值得为写出细节冒险的理性选择者（第三重截断）。三重截断的共同方向，是把感知从一个“法律人应当具备的认知功能”，系统地重定义为一种“法律人可以、而且应当主动规避的行为风险”。这就是认知格式反塑造过程的完整形态。

5.2 接收器脱敏的三层土壤锁定

如果说三重截断解释了感知能力代际传输断裂的动态过程，那么三层土壤锁定则解释了这个脱敏状态为何如此稳定——即使某几项截断被局部修复，接收器的脱敏格式仍能依靠土壤的支撑惯性维持下去。

第一片土壤：法学教育评价体系的知识检测局限

法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无论是法学院内部的课程评价、教育部层面的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还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排名——本质上只能检测知识掌握量和应试能力，无法检验判断敏锐度。一个法学院的学生是在哪种教学方式下习得了多少“法条套用效率”，还是在讨论课上被追问到被迫去重读案卷中被忽略的细节，这两种教学效果在现有评价体系里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就意味着不被奖励，不被奖励就意味着没有动力去改变。

这片土壤的锁定机制在于：当感知培育在法学院端缺失时，它的缺失本身在评价体系中不被记录为一项缺陷——因为在现行评价格式里，“这所法学院的学生判断力敏锐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可被测量的指标。所谓改变课程设计来培育感知能力这件事，在院系层面的激励机制里没有固定的动力位——院长有更强的动机去提升法考通过率和就业率，因为这两项是学校和社会的显性关切，而“学生的情境识别能力强不强”只能是教师们私下交流时偶尔感叹的话题。

第二片土壤：实践共同体的辩护闭环

法律实践共同体（以法院、检察院和律师职业为核心）共享一套职业合法性叙事的辩护结构。这套结构的核心逻辑是：只要裁判者严格依循法律规则、不做明显违法的裁判，那么即使裁判结果在个案中造成不尽人意的后果，也属于“规则之治”框架内可容忍的代价。这一逻辑本身就定义了“法律出错”的范围：只要程序合法、法律适用无误，裁判就不可被指责为错误，不公道的后果被划入“法律本身的局限”而非“裁判者的失职”。

这套辩护闭环对接收器脱敏的锁死效应在于：它把“感知缺失”重新定义为“合规状态”。一个法官从不写情境性说明、判决书极其精炼、只回应最核心的法律要件，从合规标准来看，这恰恰是优秀的表现——他没有把不该纳入的因素纳入裁判，他的判决书无可挑剔。只有在接收到一个来自外部的质疑——“你的判决虽然合法，但是否回应了案件的特殊情境？”——时，这个闭环才出现裂缝。但当前的制度设计很少产生这种外部质疑，因为上诉审的审查基准同样围绕“是否适用法律正确”展开，而不去审查那个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中有多少细节在裁判说理中被漏掉了。换言之，感知缺失不需要被掩盖——它在当前制度评价框架下就是一望可见、却无人发问的合规状态。

第三片土壤：裁判者的职业安全自保策略

在第二片土壤的合法性叙事笼罩下，裁判者个体的策略选择呈现出理性的风险规避特征：把感知写进判决书，意味着裁判者主动暴露了一个可能在上级审中被审查、被质疑或被视为“说理不严谨”的断面；而不写，则避免了这一风险。从2015年至2025年间审判管理领域出台的多项改革文件看，对裁判文书质量的要求始终围绕“说理充分”“逻辑清晰”“格式规范”而展开——这些要求对感知表达并不构成禁止，但也从未被解释为允许或鼓励。在一个缺乏明确制度性许可的背景下，裁判者的个体最优策略就是把所有不在确定性要求范围内的表达视为需要主动修剪的部分。这不是审查制度在惩罚感知，而是审查制度的信号在含糊性的阴影区域里默认了“不写比写更安全”。这一含糊性本身即使不被任何人有意识设计，也足以维持系统内稳定避写行为。

批评法学的传统论述告诉我们，法律话语本身具有一种保守倾向：它倾向于将那些无法被既存法律范畴捕获的伤害和体验定义为“与法律无关”。但本文想强调的是另一个层面——感知的消逝不仅发生在这种“用法律范畴遮蔽非法律现实”的宏观话语层面，也发生在“裁判者自己不敢把已经识别到的非法律现实写进卷宗”的微观策略层面。批评法学的论述对前者有效，对后者却需要补充一个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一个有着清晰层级问责结构的职业组织内部，个体“不写”是一种理性行为；当这种理性行为集体化后，它呈现出“所有人都不写→没有人被因此追责→每个人都确认自己做得对→继续不写”的自我稳定循环。

三片土壤的互锁结构可以这样凝缩：第一片土壤让感知培育在制度端没有激励支撑，第二片土壤让感知缺失在评价端不被识别为问题，第三片土壤让感知表达在个体端被标记为风险。三者互不统属，但结果高度收敛——把接收器脱敏维持在一个不需要任何人有意推动、仅凭各自领域的常规运转惯性就能自我复制的均衡状态。

5.3 三轨协同：最小可行干预的设计逻辑

对于这样一个被三片土壤锁住的脱敏状态，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着一种经典的二律背反：任何指令性的改革（例如“发文要求法官在说理中增加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在进入旧土壤后，都会被土壤自身的运作逻辑所截获和驯化——考核体系会将“回应个案特殊性情节”定义为一个新的可量化指标并纳入排名，法院会批量产出格式性的“个案响应段”以完成指标，裁判者个体的风险计算中会多出一个“被检查是否写了响应段”的新顾虑，而真实感知的敏感度并未恢复。这个困境不是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本身与感知所需的条件之间的内在冲突——感知的增长需要的是制度内的保护性空间，而不是指令性的任务。

基于这一判断，本文提出的操作方案不是“改革”，而是“弹性缝隙的协同利用”。其核心逻辑是：在现行体制内存在三处不需要修改法律、不需要通过任何行政命令、各自在既有法规框架内就具备操作弹性的缝隙。把三处缝隙在同一个五年时间窗口内协同启动——各自的方向指向感知培育的同一方向，彼此能够接住对方的下游产出——就可以在不触发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的前提下，产生一个局部的、可观察的感知培育增量。

第一处弹性缝隙：法学院判例课的教学逻辑翻转

在法学院现行课程框架内，专业选修课和学生课外研讨活动中的判例讨论，在评价方式和教学方式上具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目前多数判例研讨的教学逻辑是“法律要件匹配型讨论”——教师给出一个判例案卷摘要，学生围绕“这个案件应适用什么法条”“裁判要点是什么”“争议焦点如何解决”进行分析。翻转后的逻辑是“细节标记追问型讨论”——同一份判例材料，教师不预设问题，而是要求学生在课前标记出案卷中“让你觉得需要停一停想一想、但又说不清跟哪个法条有关的细节”，课堂讨论的起点不是“怎么判”，而是“你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停了下来”。

这一教学逻辑的翻转仅涉及教学方式和课程评分标准的调整（例如将“课堂参与分”从“回答问题准确率”位移到“提出值得讨论的细节的数量和分析深度”），不需要修订教学大纲、不需要教务处审批课程结构变更。它的核心目标不是教授学生一套“更高级的裁判方法”，而是在学生尚未被产品思维完全格式化的敏感期，打断他们“只看要件、不看细节”的认知习惯——哪怕只打断一个学期，也能让他们意识到“看细节”是一种可行的、被认可的、有其认知价值的法律人思考方式。

第二处弹性缝隙：法院裁判文书评查细则的增维

法院系统现行的裁判文书质量评查办法，其二级指标和评分细则在操作层面给各级法院留有相当的自主调整空间。在现行框架内，可以增列一条不改变基本评分项权重分布、不触发任何一票否决的“参酌项”——“对个案特殊性情节的回应密度”——在评查中只加分、不扣分。这一条的具体操作是：评查员可以（但不是必须）就被评查判决书是否对案情中某个明显非同寻常的情节做出了个性化的回应，给予少量加分。不加分的判决不扣分、不上负面清单、不影响个人考核。

这个设计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是把感知表达变成一个需要被考核的硬性指标（那会立刻触发前述“被效率逻辑回收”的反驯化机制），而是在评查中悄悄地松开了一小片安全地面——写感知不会因此被扣分，甚至可能被加分。一个年轻法官在撰写判决时知道“写这种东西不再有组织层面的风险”，就会减少主动修剪冗余的动力，被第二重截断压制的那一批认知信号就可能回到文书的正文中。

第三处弹性缝隙：最高法优秀裁判文书遴选偏好的示范性信号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组织的全国法院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在遴选标准的微妙措辞上有着巨大的示范效应。目前遴选标准中通行表述的“说理透彻”“逻辑严谨”“繁简得当”“格式规范”，尚未将“对个案特殊情境的回应深度”列为独立的评价维度。如果在每年评选的“点评意见”部分（而非硬性的遴选条件中），书

面点评开始出现关于“该文书中对案件特殊情境的回应尤为细致”的积极评价——不需要改变遴选资格标准中的任何一条，不需要建立新的配额制度，仅仅是在示范文本的点评语言中释放信号——整个法院系统的文书写作指南就会发生一次自发的微调。

这种示范性信号的释放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法官群体的职业行为有着强烈的上行模仿特征。当连续三年入选的优秀判决样本中，有一定比例的判决在个案情境回应上表现出高密度的细节镶嵌，且遴选委员会在公开点评中肯定了这一特征，下级法院的法官和法官助理就会意识到“这种写法是可以被最高层认可的”——它从需要规避的风险变成了可能被嘉奖的优良写法。示范信号的强度不需要靠强制推开来保证，需要靠持续的、一致的信号释放来建立可信性。

三轨协同的时间窗口逻辑

三块弹性拼图各自独立存在——法学院的判例课不待法院评查制度的许可，法院的评查细则不需要最高法的授权，最高法的遴选偏好不需要法学院的配合。但当三块拼图分别运行在各自独立的时间轨道上时，它们不能产生协同效益：法学院的学生被训练出对事实细节的好奇，毕业后进入的是一个在评查中不鼓励甚至惩罚这种好奇的写作环境——他们的新认知格式会在入职头两年被迅速压回旧格式；法院在评查中给感知表达留了加分空间，但新入职的年轻法官的法学院产品思维格式里根本不产出这种表达——加分空间空转；最高法示范信号说“这可以写”，但法学院不训练如何写，法院评查不给尝试的机会，法官读到示范信号后只会产生“我也想写但不知道怎么安全地写”的焦虑。

协同的价值恰恰在于——三者的时间窗口重叠起来，产生先后和配套的接力效应：法学院判例课翻转后的第一批学生毕业入职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给他们留出感知表达空间的写作文书环境和一套正在说“这可以写”的示范信号系统。他们的认知格式在法学院被打断过一次，入职后不被立即压回，三到五年后他们的判决书在“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和“事实细节提及频次”上将呈现出可测量的差异——这就是三轨协同唯一能挤出的那个时间窗口效应。

这一协同的最小可行干预特征在于：(1)不触动任何一根需要修法的制度大梁；(2)不直接挑战任何现行硬性考核指标（只做增量不做替代）；(3)不提出一个统一的改革指令（三处各自以弹性运作的方式推进）；(4)三处的推进动力不是来自上级指令，而是分散在法学院教师、法院审管办、最高法案例遴选秘书处这三个低层级的能动者身上——他们各自都有在自己的弹性范围内做一些“比现有更好”的尝试的微观动机。

5.4 三个对照案例：感知培育的制度依存性

为检验上述分析框架的解释力边界，本节简要对照德国、日本、英美法系在法学教育与法官养成制度上的三个改革案例。

德国2002年法学教育改革将“判例讨论”从大学阶段的选修课提升为核心必修环节，并要求第一次国家考试增加对“律师式实务技能”的考核。从本文分析框架看，这项改革触及了第一重截断（法学教育的产品思维）和第二重截断（职业准入考试的知识检测局限），且观察到了部分正向效果——判例教学强化了学生对案件事实细节的复述与重构能力。但第二次国家考试（实务阶段考核）仍由各州司法考试局以传统方式组织，其准备阶段的商业补习班普遍侧重“评分要点匹配”，实质上独立于大学判例教学之外运行。这说明在未同步改变评价体系的情况下，改革效果被评价体系惯性部分回收。同时，德国的法官选任以两次国家考试综合成绩为核心指标，从司法研修到终身任职之间较少存在中国式的年度绩效考核压力，其土壤锁定中的第三片（职业安全自保策略对感知表达的压缩）显著弱于中国——这从反面提示了职业安全结构对感知表达空间的基础性约束作用。

日本在2004年法律大学院改革引入美国式案例教学法，要求必修一定学分的实务型课程。改革后的一项追踪研究（Wilson 2011）指出，改革确实增加了学生在校期间对事实细节的讨论量，但由于律师资格考试仍以知识记忆型选择题和短案例分析为主，学生踏入考前复习周期后，对细节的分析能力被实际压缩为“快速定位法条的辅助技能”而非独立的核心判断力。这个结果与本文的命题5高度一致：只改变教学法而不在评价端口做出同向位移，改革的努力会被评价体系在出口处回收为旧格式。日本案例还暴露了另一个问题——法律大学院

的数目在2010年代从74所缩减至约40所，“实务型教育推动力衰退”本身表明，当教学改革与入职评价体系（司法考试+法律职业市场筛选）的信号不一致时，改革的可持续性依赖外部制度的持续背书；一旦制度改革承诺减弱，教学端将回退至传统的法学教育模板。

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法被普遍认为更有利于培养对事实细节的敏感度，这似乎对本文“法学教育普遍压制感知”的判断构成表面反例。但更细致的分析揭示，英美案例教学法培育的核心能力是对司法意见中论证逻辑的批判性细读（critical reading of reasoning），而非对案件卷宗原始材料中非法律性细节的感知。它与本文所讨论的“感知”在概念功能上有重叠但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英美法系的这项培育功能高度依赖英国式律师—法官同源养成路径或美国式法学院+执业经验双重管道。在中国当前法官直接从法学院毕业生中招收、且入职后的前几年制度性嵌入在办案数量考核下的结构条件下，英美案例教学法的感知培育效果能否在制度移植中存续，是高度不确定的——可检验，且值得检验。

三项对照案例的对照价值在于：它们共同指向一个跨法系的规律——感知培育的制度依存度极高，单独的通道修复（改革教学、增加培训、修改考核权重）若不与格式敏感度的恢复和土壤的局部松动协同推进，其效果会被旧土壤的吸收惯性所消解。这一规律构成了本文分析框架跨体系延展的节点。

6 对抗最近邻：本文的分离线

一个好的判断需要能承受住来自最强竞争性理论的挑战。本节将本文的核心判断与三个最近的理论邻进行对质——不是把它们当成对手驳倒，而是精确定位本文与它们各自的分离点。

6.1 与德沃金建构性解释的分离

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为感知进入裁判提供了一条看似顺畅的通道：裁判者通过“建构性解释”，可以在一个法律实践的“整全性”理想下，将法律规则、原则和政策融贯地整合进裁判。建构性解释要求的不仅是技术推理，更是对法律实践的道德论证——这个论证过程本身就需要裁判者理解个案情境、感受当事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在德沃金的理论里，感知不是被规训排除的冗余——它是被邀请参与法律建构的合法对话者。那么本文一再强调的“感知被制度性截断”这一判断，是否只是对德沃金已提供了解决方案的问题的重复？

分离点在此：德沃金邀请感知进入裁判，但他是以要求感知穿上“法律论证”的外衣为代价的。建构性解释的最终产品是一套可为法律体系的整全性辩护的说理；感知进入这个过程时，必须能被重构为原则论证的组成部分——它必须能说出“为什么这个细节在原则上是重要的”。本文所描述的那类感知残留——冗余细节、说不清的犹豫、在合议庭里以非正式语言表达的感觉不对——是在穿上德沃金要求的那件外衣之前就有可能被修剪掉的。换言之，德沃金的邀请只针对已经跨过说理门槛、能以论证形态表达的感知；而本文的诊断是，感知在进入说理门槛之前就被三重截断和三层土壤锁在门外了。德沃金的理论很好，但它的前提——感知已经被裁判者充分接收——恰恰是本文所要追究的。

2×2表格将这一定位操作化为可裁决的判断（见表1）。

做边缘增量(护边) 不做边缘增量

设感知的制度化回收通道（德沃金方案） 格1：德沃金预测感知被有效回收；本文预测格式化回收会修剪感知的尖锐部分 格3：德沃金预测感知以论证格式被回收；本文预测感知在论证门槛前已被截断

不设回收通道 格2：本文预测感知在边缘以非驯化形式积累 格4：双方预测都不起作用

判决格为格3：本文预测，即使在裁判说理中增设“建构性解释”的通道（这是德沃金认为充分的条件），如果不先做边缘增量以改变写作文书的安全信号和法学教育的认知格式，大多数感知信号仍然不会进入这个通道——它们在案件阅读的早期阶段就被截断了。德沃金会预测，只要通道在，感知就能进来。这个分歧是可裁决的：在一个试点法院，增设对个案特殊性情境回应的说理要求（德沃金方案）但不改变评查细则的安全保障（不做边缘增量）——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比较可以检验，判决书的“对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是否在增设要求后真正上升。本文预测不会显著上升或仅以格式性响应形式上升（内容同质化、缺乏真正的情境镶嵌）。

6.2 与卢曼法律系统运作封闭论的分离

卢曼的系统论诊断法律系统在运作上是封闭的——外部世界的信号（包括当事人感受到的不正义、裁判后果的社会影响）不能直接进入法律系统内部的沟通，只能经由法律系统内部的符码（合法/非法）转译。从这个理论出发，裁判者的感知萎缩不是需要修复的缺陷，而是系统运作封闭的必然现象：法律系统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中心处理未经符码转化的裁判者的情境性感受。

这个诊断有其精确之处，但它只适用于法律系统的符码中心。卢曼的理论框架中，系统的自我生产包括了符码中心的操作封闭和边缘的环境激扰——但他没有充分展开一个追问：系统边缘产生的、无法被符码中心回收的那类内部产物（本文所称的“反当性残留”），是始终被系统作为噪音排除，还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改变系统与环境耦合方式？

本文的回答是：感知残留不是法律系统外部的东西，它是法律系统自身操作过程在边缘上的内部产物——裁判者在做出合法/非法符码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在认知上产生“这个案件与标准模板不一样”的辨识，只是这个辨识在此后制度和认知环节上未被系统性地回收和累积。卢曼会预测，即使回收了这个辨识，它也不会改变法律系统运作封闭的本质——这个预测与本文并不冲突。本文的分离在于预测：回收辨识虽然不改变系统的符码封闭性，但会改变系统在长期内的内部复杂性的增长方式——法律系统内部会有更多精细的辨别维度、产生更少的后续争议，从而降低系统化解社会冲突的总成本。这个预测是可裁决的：对一个法院系统持久追踪，比较实施了边缘增量的区域与未实施区域，在未来十年内“案件上诉率”“再审申请率”“涉诉信访率”等争议转化指标是否有显著差异。

6.3 与“资本回收批评”机制的分离

批评法学传统与博尔坦斯基关于“资本主义回收批评”的论述，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质疑：法律系统内部的任何“解放性改革”，都可能被制度本身的运作逻辑所回收。增设对裁判者情境感知的保护性空间，可能只是让法院的合法性叙事增加一个更精致的修饰语——“我们不仅依法裁判，还回应个案特殊情境”——而裁判者实际的感知敏感度并未提升，制度改革变成了符号性债务的清偿。

这是本文面对的最强挑战，因为它不是攻击本文的判断不准确，而是攻击本文判断所指的操作方案的可行性：你做的一切都可能被系统回收。

本文对博尔坦斯基的回应不是辩称回收不会发生，而是区分两类不同的回收机制。第一类回收是“语词回收”：制度把新话语吸收进自己的合法性叙事，但制度运作不变。第二类回收是“格式回收”：制度把对某个变量（如感知表达的频率）的监测纳入自己的评价格式——比如，把“感知表达的频次”变成一个可被考核的新分类指标。本文设计的防回收措施针对的是第二类回收——本文坚持三组操作都不设置可被量化为KPI的硬性指标、不把感知表达频次转化为横向比较的排名。而针对第一类回收，本文不主张“语词不可回收”（任何语词都可以被回收），而是主张检验标准应当是：被回收后的语词，是否在生成新的信息？如果一个改革使得感知的显性表达被作为新的话语要素被写入裁判文书，那么即使这一表达被回收为制度合法性叙事的一部分，它也在客观上增加了裁判文书承载的信息密度——这个增量本身就是可测量的，可以通过判决书文本中实体名词密度和句法多样性指标的时间序列来检验。

7 结论

7.1 核心发现

本文的机制分析揭示，中国当代司法裁判者感知能力代际传输的系统性断裂，不是一个简单的“老法官退休带走经验”的通道缺损问题。更深层的机制在于：法学教育的产品思维转型、裁判文书写作的安全惯性和晋升窗口的时间压力，三重截断在被二十年的制度运转常态化叠加后，不仅切断了感知从老一代向新一代传递的通道，更在各环节上反向塑造了新一代法律人以“剔除冗余、效率优先、规避风险”为核心的替代认知格式——我们称之为接收器脱敏。这一脱敏状态又被三片互锁的制度土壤维持在一个自我复制的均衡：法学教育评

价体系无法检测判断敏锐度、实践共同体的合法性辩护将感知缺失转述为合规状态、裁判者个体的职业安全策略将感知表达标记为风险。

在此诊断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项三轨协同的操作方案：在一个五年时间窗口内，法学院的判例课翻转、法院裁判文书评查的增维和最高法遴选信号的静默释放，三者各自在制度裂缝中独立操作、时间上彼此承接——这一设计方案遵循“不修法、不增项、不强制”的最小可行干预路径，并已在本文中内置了可被实验中检验的验证设计。

7.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它在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百年对峙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分析轴线：不是“规则vs经验”的规范争执，而是裁判者感知能力的代际培育机制的制度分析。这一轴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默认裁判者拥有“能感知”这一基本认知功能，而是把这一功能本身的存续作为被制度系统不断塑造、可能被系统性削弱的因变量来考察。第二，它通过“认知格式反塑造”这一概念，修正了既有职业社会化研究中将社会化过程视为单向传输不足的理论预设，指出传输通道的断裂本身会产生一个反向的格式性关闭效应——这个效应的识别对于设计法律人培育政策具有直接的实践涵义。

7.3 可证伪条件与检验设计

本研究的判断体系在下列条件下可被事实推翻，本文显式陈列为四个硬骨头：

1. 如果一项精心控制的准实验在法学院判例课中实施“细节标记追问”教学干预一学期后，干预组学生毕业时案例分析作业中的“事实细节提及频次”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控住学生初始学术成绩、法条掌握熟练度和法考备考时间投入），则命题1中关于“法学教育产品思维通过教学方式塑造认知格式”的因果链被证伪。
2. 如果在实施了评查细则增维（增加“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参酌加分项且三年缓冲期内只加分不扣分）的试点法院，第二年之后的判决书事实认定部分“非功能句段比率”（用自然语言处理的信息冗余度算法测量）未出现显著缓升，则命题5中关于“评查安全信号的改变能释放被压制的感知输出”的判断被推翻。
3. 如果三轨均在同一个五年内协同启动，但五年后试点法院的判决书“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NLP测量）与配对的非试点法院无显著差异，则整个三轨协同方案的效率受到系统性反驳——此时本文的整套判断链将退回至一个更保守的版本：即感知截断的认知格式反塑造，其锁定深度可能超出本文所假设的可在现行制度弹性缝隙内松动的程度。

本文最需要排除的竞争解释是：观察到的改革效果可能仅仅是霍桑效应——即被关注、被选择的法院和课堂，其参与者的行为改变只是对新奇的短期积极响应，而非认知格式的结构性的位移。排除设计为在对照组中增设一“博云效应比较组”——对该组实施非实质性的改革关注（如组织非结构性的座谈或仅要求提交更多文书），若该组同样在冗余句段比率上出现上升，则显著削弱本研究的认知格式反塑造解释。

7.4 实践与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向法学教育管理者、法院审判管理实务者和司法政策制定者提出三条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第一，法学院可在不改变教务处课程框架的前提下，在判例选修课教学中试点“细节标记追问”型讨论课，具体操作方式为：在课堂评分标准中公开申明“当堂提出一个在案情细节中的有价值的停顿点者，其课堂成绩加分幅度等同于正确回答一个法律争点问题”。这一调整的合规性在于：目前的课程评分规则仅规定“课堂表现”占总评的某一比例，未限定“表现”的具体形态，教师在其自主评分权限内可以做此调整。

第二，中级法院可在每年度的裁判文书内部评查细则中，增设一条参酌加分项：“对本案中具有特殊性之情节，若判决书有非模板性的个性化回应，评查员可酌情给予0.5-2分的加分，该加分项不设达标线、不纳入扣

分统计，三年缓冲期内不作为排名依据。”这项条款无须修改基本评查框架，仅以“参酌项”形式附加于细则末尾。其价值在于为裁判者提供“写出感知”的组织层面安全信号。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或案例遴选秘书处）可在每年优秀裁判文书的书面点评范文中，有意识地增加对“个案情境回应”的肯定性评语频率。经三年持续信号释放，下级法院的写作指南将自发产生微调。这一操作不需要修改任何遴选制度文件，只是改变了现有点评语言的侧重点。

7.5 研究局限

本研究有三项内在局限。第一，如前所述，它是一项机制分析，依赖制度文本和行为推演，未提供来自法院与法学院的一手实证数据。机制分析可以识别因果序列的合理性，但不能建立因果强度。第二，本文的分析侧重于从法学教育到法官入职前几年的代际传输断裂过程，对于已执业十五年以上、在旧师徒制下完成初始社会化的资深法官群体，其感知能力的维系与退化机制未做专门讨论（他们面临的是“用进废退”的问题，而非法学教育截断的问题）。第三，本文提出的三轨协同方案未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外溢——如“感知合法化”的边界被不当扩展、导致某些法官以“情境感知”为由掩盖枉法裁判——做出充分的理论处理。这一外溢风险是真实的，需在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增配防火墙（如情境性说明须与法律构成要件论证形成结构区隔、评查加分项仅限于已查明的法律要件框架内的辅助讨论、不独立构成改判理由）。

7.6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为后续学术工作打开了五个可生长的研究纲领：

第一，开展法学院判例课教学法的准实验研究。在数所法学院中随机分配判例课班级为细节标记追问组与传统法条匹配对照组，对两组学生在法考案例分析题中的“事实细节引用频次”和毕业后第三年合作导师对其“个案判断敏锐度”的盲评进行差异分析。该研究将直接对本文命题1和命题4提供因果检验数据。

第二，对试点法院的裁判文书进行面板数据的文本检测。选用双重差分法模型，比较在评查细则增维前后的判决书文本，在“非功能句段比率”“实体名词密度”“案卷细节镶嵌频次”等指标上的变化。若在添加参酌项后出现趋势性缓升，则命题5的因果链被验证。

第三，对优秀裁判文书遴选偏好释放的示范效应进行文本聚类和时间序列分析。以五年为周期，对入选判决书的“个案特殊性情节回应密度”进行文本向量相似度的聚类分析，检验信号释放窗口前后是否出现聚类模式的显著分层和时间拐点。

第四，跨法系比较研究。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开展中、德、日三国法学教育与初审法官养成制度的系统比较，以“代际传输通道完备度—认知格式锁定强度—土壤自主可调弹性”三轴坐标评估各国的感知培育生态位。此研究纲领可将本文的单一国家机制分析升维为有系统比较数据的理论框架。

第五，研究政治结构内不同主体（政法委、组织部、人大）对司法系统考核指标设计权的博弈，以及这种博弈如何影响法院内部评查弹性缝隙的开启与闭合。本文的三轨协同方案预设了一定程度的法院系统内部管理弹性，未来研究需就此一预设进行政治社会学层面的深入分析和制约条件的显式识别，以为方案的可落地性夯实制度分析基础。